

当面临生命最后的挑战，女儿赵小兰要陪她去医院就诊时，她却满脸困惑地问道：“你现在不是应该在工作岗位上吗？你肩负重任，国家和人民需要你。”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爱。

就在弥留之际，她也还在替他人着想。在她人生最后的那个夜晚，连说话与呼吸都颇感困难时，却示意想要自己的毛毯，并喃喃地说着什么。小女儿安吉只听到“毛毯”，便赶紧起身去拿来另一条帮她盖好。她却吃力地摇摇头说：“不，你给Joginder（她的私人护士）盖上，这里很冷。”当安吉抬起头时，只见Joginder眼中噙满泪水，病房中所有其他的人也无不被这一幕深深震撼。突然之间整个病房变得寂静无声，大家都努力克制着各自的情感，让感动的泪水化作默默的祝福。

教堂也寄托着朱木兰的爱，那是她心中的家，是她与心中的主对话的圣地，是她寄托终生信仰的地方。每逢星期四上午，她都会雷打不动地去教堂，接受主的教诲。有时教会举行午餐会，她总是尽其所能进厨房餐厅做义工。她心中充满感恩，爱的奉献付出是她一生坚定的信念。

厚德载物 恩泽长流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朱木兰身在异乡，却心怀故土，和丈夫赵锡成博士一道，关心和支持中国教育事业和中国航运造船事业的发展，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自1984年以来，她就默默地成立了“木兰教育基金会”（2006年11月正式更名为“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奖励品学兼优的莘莘学子。该基金至今已使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高校的2400多名学生受益，在教育和航运界享有盛誉。当年曾荣获“木兰教育基金”的学生们现已风华正茂，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栋梁。2007年，“上海木兰教

育基金会”捐资100万美元给上海海事大学兴建教学大楼。为了感念她饮水思源、回报社会的崇高德行，上海海事大学特意将学校新建的这栋最高大楼命名为“木兰航运仿真纪念中心”。这是一所世界一流的航运仪器训练中心，全部逼真模拟海上情况。

朱木兰的丈夫赵锡成是上海交通大学的著名校友。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航务系，毕业后赴美，曾担任交大美洲校友总会长和校友基金会董事长。赵锡成、朱木兰夫妇对上海交通大学怀有深厚的感情，长期关心和支持学校的发展，如捐资兴建“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大楼。为了缅怀朱木兰女士的高贵品德和纪念她用一生所诠释的“博爱、乐观、坚毅、进取”的木兰精神，上海交通大学将这座大楼命名为“木兰船建大楼”，同时在该大楼的一楼设立“赵朱木兰陈列馆”。二者均已于2008年5月9日举行了落成典礼。

2007年8月2日，朱木兰因病在纽约去世。她生前处世低调，身后无限哀荣。从中美两国领导人、部会首长到亲朋好友都致函表达了深切哀思。布什总统在唁函中称赞朱木兰女士“是一位非凡的女性和心中充满深爱的母亲。她的精神和宽容给孩子们和知道她的人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是一位勇敢的女性，为了让她的家庭在美国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不知疲倦地工作，并且建立了一个完美的家庭。”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则赞美她的一生“体现了中华女性的传统美德，深受尊敬和爱戴”。用她家人的话说就是，“她很谦恭，常说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她一生敬谦爱神，爱人，爱家庭，对社会默默无闻地奉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从中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这是人生价值的崇高境界，是平凡与伟大的最完美的结合。”（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档案馆



▲剧照之一：侦察英雄严伟才

一、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

1957年底，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并到志愿军司令部看望官兵。当时，志愿军政治部有一个京剧团，活跃在朝鲜战场上。这个京剧团的前身是在东北各地卖艺的戏班，东北解放后，他们集体报名参了军，成为“四野”的一个部队京剧团，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他们被编为志愿军京剧团。这个团的主要演员水平都不差，如殷宝忠是谭富英的门生，方荣翔乃裘盛戎的弟子。周总理观看了志愿军京剧团演出的传统剧目《秦香莲》后对他们说：你们不久就要回国，用什么向祖国和人民献礼呢？京剧团的同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搞一个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戏，后来选定了《奇袭白虎团》。

它取材于1953年7月朝鲜金城战役

京剧《奇袭白虎团》的 风雨历程

中志愿军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的真实英雄事迹，参照了《志愿军一日》中的有关文章。当时美国侵略者与李承晚纠集十万兵力，以王牌军“白虎团”，在金城一线强势出击，实施其北进计划。杨育才奉命带领侦察班，化装为敌军，像尖刀一样直插敌人心脏，捣毁了白虎团指挥部，确保了金城反击战的全线胜利。这个战役“十二万敌军一袋装”，震惊了中外。1957年6、7月间，京剧团的同志下部队详细了解战役的情况，采访了杨育才和团部苏政委、侦察班战士等当事人，回来后即开始编写剧本。剧团里没有专职编剧，就由演员李师斌、方荣翔、李贵华执笔，后殷宝忠也参加了。这个戏完全忠实于真人真事，戏编好后，请杨勇司令员、作战处同志以及参加过战役的同志观看，请他们提意见。之后在朝鲜战场演出了许多场，效果很好，很受指战员的欢迎。

1958年10月，志愿军京剧团撤军回国，就把这个戏带了回来，在大连、青岛等地演出，很受欢迎。1958年12月，京剧团并入了山东省京剧团。

1963年9月，中央文化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文化局发出通知，准备于1964年3月在北京举行部分地区京剧现

代戏会演，后又决定推迟至6月举行。

1963年秋天，山东省先期举行了全省的现代戏剧会演，经过加工修改的京剧《奇袭白虎团》和由淄博京剧团、青岛京剧团合作的《红嫂》等参加演出，获得好评。省委决定进一步重点加工《奇袭白虎团》，委派了省委宣传部部长王众音、副部长严永洁领导这项工作。

这次重点加工，做了几件工作，一是加强创作力量，调来了专业编剧孙秋潮、导演尚之四及新音乐工作者。还组织创作人员和演员下部队深入生活，再次访问了当时已到济南军区工作的杨育才同志和王团长等，并与侦察兵一起训练擒拿格斗。

二是丰富、充实剧作的内容。为了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把杨育才改名为严伟才，戏中增加了表现与朝鲜人民亲密关系的内容，原来，朝鲜阿妈妮和崔大嫂戏份很少，旦角戏极为薄弱，加工后使之贯穿下来，并加重了旦角的唱工，在侦察班插进敌人心脏之前，增加了侦察的情节。

三是在艺术表现方面进行加工打磨，重点是舞蹈和武功方面的加工。为了突出侦察班穿插敌后的武打技艺，

借鉴、吸取了传统京剧《雁荡山》里的某些表演技巧。还请省歌舞团的同志帮助设计舞蹈动作，使严伟才和侦察班战士的武打和舞蹈动作更加新颖、壮美，特别是对“插入敌后”及“奇袭伪团部”这两场的武打场面，进行了精心的加工，无论是攀山越崖，跃过铁丝网，穿过布雷区，直插敌心脏，其舞蹈、开打，无不精彩、洗练、惊心动魄。另外对全剧的音乐也进行了整理和加工。

四是为了更好地塑造英雄形象，对演员阵容作了适当的调整。以前扮演杨育才的是老演员李师斌，他唱得很好，但年龄偏大一点，武打翻扑似感吃力。这次大胆起用了优秀青年文武老生宋玉庆扮演主角严伟才，当时他只有23岁。另外，方荣翔扮演团长，殷宝忠扮演志愿军政委，邢玉民扮演韩大年，俞砚霞扮演崔大嫂，栗敏扮演崔大娘。

1964年春，文化部艺术局的周巍峙（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秘书长）和沈西蒙等同志来山东审查剧目，他们看了《奇袭白虎团》等剧目，对《奇》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基本确定《奇袭白虎团》和《红嫂》两剧进京参加会演。



▲剧照之二：崔大嫂（左）和崔大娘（右）侦察敌情

二、全国观摩演出 大会上的风波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京剧现代戏展演盛会，有19个省、市、自治区的29个演出团体以及各地30个观摩团参加，正式出席的人员达2400余人。共演出35个剧目，244场，观众达20万人次。

《奇》剧在北京人民剧场首场演出时，周恩来总理就来观看；周总理第二次来看演出时，因为接待外宾，来晚了，演出结束，上台接见演员，他称赞《奇袭白虎团》唱得好，演得好，演得真像兵。总理说，你们带了一个好戏来，带了一个好的队伍来。周总理看到舞台布景上写有朝鲜文字，殷宝忠告诉总理，朝鲜过去都写中国字，1952年以后才写朝鲜字。总理说，要尊重他们，要写朝鲜字。殷宝忠告诉总理，布景上的朝鲜字是“泉瑞里”，是朝鲜一个真实的地名。总理说，用真名不大好。（后来改为“安平里”）。总理还说要

请朝鲜大使来看。最后，周总理说，请你们到小礼堂为中央领导、中央工作会议演出。

后来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观摩大会的全体演出人员和观摩人员，毛泽东分别和周恩来等领导人观看了上海演出团的《智取威虎山》和北京京剧团的《芦荡火种》，周恩来、董必武、陈毅、陆定一等观看了《奇袭白虎团》等剧目。会演期间，周恩来、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为大会作了国际、国内形势等8次报告。

同时，在这次会演中也充满了斗争。这次京剧现代戏会演原是周总理倡导举行的，在整个会演过程，周总理亲自过问，亲自指导。江青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一心想插足其中。1963年她就到上海所谓“抓创作”，搞《智取威虎山》和《海港》。在北京，她又扼杀了《红旗谱》和《朝阳沟》。这次会演的领导成员中，原来并没有江青，江青到周总理那里去哭闹，后总理安排江青、康生、周信芳为大会顾问，江青、

康生参加了领导班子。会演期间，江青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康生、张春桥也分别作报告或讲话，他们极力兜售“文艺黑线专政”论，极力鼓吹“大写十三年”，并充满杀气地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文艺界的领导和京剧老艺术家。他们公开点名批判阳翰笙的影片《北国江南》及《早春二月》、《舞台姐妹》、京剧《谢瑶环》、昆剧《李慧娘》等，把这些作品统统称为“大毒草”，顿使会演充满了火药味。

对《奇袭白虎团》的评价，也成了斗争的一个方面。江青在第一轮第四场演出时观看了《奇袭白虎团》，同来观看的还有陈其通等。当时江青看了演出，说演员很好，演出很好。她又问大家生活情况怎样？剧团汇报说青年演员几十元一个月，江青说：“要像运动员一样的待遇”。后来情况有了变化。第一轮演出后，《奇袭白虎团》反响很好。它在成功运用京剧传统表演程式和身段表现现代战争生活方面，显现出夺目的亮色，而青年演员宋玉庆融老子与武生于一炉的表演和演唱，既有昂扬的激情，又充满军人的阳刚，获得普遍的赞誉，老艺术家盖叫天也称赞演得好。新华社在报道中把《奇袭白虎团》放在《智取威虎山》的前面，作了主要介绍和评论。报纸上也发表了一些赞扬性的文章，戏剧评论家林涵表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智取威虎山〉观后漫笔》，文章谈到杨子荣在座山雕面前匪气不足，容易引起座山雕的怀疑。对《奇袭》的评价高于江青抓的《智取》，而且有人对《智取》说三道四，使江青大为恼火。在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江青责问新华社“为什么这样宣传？”江青又拿出《光明日报》，说：“我这儿还有一篇文章，也是捧一个戏，压一个戏的，要不要给你们读读？他们这么想干什么？”她还气势汹汹地责问：“是坐在正面人物一边，还

是坐在反面人物一边？”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是观摩大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他连忙说：“新华社和《光明日报》的清样都送给我看过，我认为基本符合事实，没有考虑压谁，捧谁，就同意发了，这事不能怪新闻单位。”江青这才没有追问下去，她又回过头来对山东代表团团长严永洁说：“这样搞不好么！小严，你感觉怎样？”严永洁说：“我们的戏还不成熟，我们的队伍很年轻，我们来北京，是向兄弟省市学习的。”

接着，江青、张春桥又组织文章围攻林默涵的文章，还组织北京京剧团的话剧《智擒顽匪座山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智取威虎山》和上海京剧院的《智取威虎山》三个同样题材的戏同时演出，企图以上海的《智取威虎山》来打压另外两个剧目，打压《奇袭白虎团》。就这样，江青从开始对《奇》剧持好评，一下子转变成打压的态度。7月17日，周恩来总理安排《奇》剧到小礼堂为中央领导演出，许多中央领导都来了，但毛主席没有来，江青也没有来。后来知道江青安排在另外一个剧场组织的一个晚会，演出上海的京剧《智取威虎山》，她把毛主席拉到那儿去观看演出了。由于各种原因，在观摩大会期间，《奇》剧始终未能请毛主席观看。

三、江青千方百计把《奇》剧窃为已有

江青虽然想打压《奇袭白虎团》，但是《奇》剧在专家和观众中获得一致好评，看来打压很难奏效，于是江青的态度又从“打”转变为“拉”，也就是千方百计让《奇》剧打上“江记”的印章。

观摩大会于7月31日结束，山东省京剧团因为要“磨戏”，仍留北京。但从此，《奇》剧已掌控在江青、张

春桥手里。

在修改中，他们加了中朝并肩作战的序幕，还加了朝鲜的参谋长一角，江青也同意了。

过了几天，江青要到北戴河去休养，她到总理那里去，总理说，你去吧，《红灯记》由林默涵管，《奇袭白虎团》由我亲自管。

1964年8月初，周总理安排山东的《奇袭白虎团》和《红嫂》两个戏到北戴河向毛主席汇报演出。行前，总理嘱咐剧团“质量第一，安全第一”，并派专列送他们。到了北戴河，严永洁宣布纪律：不准下海游泳，不准吃螃蟹，以防生病而影响演出。

8月10日，《奇》剧在北戴河中直礼堂演出，毛主席观看了演出。陪同观看的有邓小平、李富春等，江青和李讷也观看了演出。毛主席兴致很高，当听到剧中人物严伟才说“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这叫谈谈打打，打打谈谈”，主席笑了：“这些话不是我讲的么！”演出结束，毛主席上台接见演员，合影留念。8月12日晚，毛主席与朱德、杨尚昆等又观看了《红嫂》。

之后，李讷跑到剧团来玩，大家问她：“毛主席喜不喜欢我们的戏？”李讷说：“喜欢！爸爸讲，山东一下子出了两个好戏，真不简单。”过了两天，江青来到剧团驻地，把剧团同志召集一起，传达说：“主席肯定了你们演出的这两个戏，要我向大家问好！但不要骄傲，戏还要继续修改。主席说《奇袭》没有陈词滥调，要达到声情并茂；《红嫂》要达到玲珑剔透。”毛主席对戏的肯定，使剧团上下受到了巨大的鼓舞。通过毛主席看戏，江青又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更把《奇袭白虎团》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四、“这个戏不过我，不行！”

《奇》剧被江青收编之后，就开始了旷日持久、没完没了的“修改加工”。

毛主席看过戏后，江青把《奇》剧组继续留在北戴河，说是要加工修改后，请主席再审看。江青说：“严伟才要有完整的唱，要有单场戏。”她又提出戏中朝鲜参谋长不要，因为这一仗主



▲剧照之三：插入敌后侦察情况

要是我们志愿军打的。这样，修改时就去掉了朝鲜参谋长这个人物。但是，在北戴河，毛主席没有再看《奇》剧。

回北京后，江青命令继续修改。《奇》这个戏原来是总理亲自抓的，江青中间插了进来。总理是很尊重江青的，戏中有的地方改了，他总是要问剧组江青的意见如何。严永洁把修改稿送给周总理，邓大姐说：“总理不懂戏，你们还是听江青的。”可是江青却反过来说：“谁叫总理插手的？”并且在修改过程中处处与总理作对。《奇》剧回北京后，修改稿在展览馆剧场汇报演出，周总理来看了，总理看到戏中去掉了朝鲜参谋长，觉得很难办，因为他请朝鲜同志看戏时，有这个人物。国庆后，《奇》剧组回到济南。

总理的意思是几个戏稍作修改都可以拍摄电影，使它们更广泛的流传。总理曾专门开会研究这个问题。严永洁与八一厂商量了拍摄事宜。1964年12月《奇》剧组再次赴京，住八一厂，拍摄电影。可是江青却说：“谁叫搞的？小严（指严永洁）迷了电影。”样片出来后，马上被江青否定了，并下命令，《奇》剧暂时不拍电影，回去“十年磨一剑”。于是1965年6月，《奇》剧调回济南。

到了1965年末，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已经发表，江青认为时机成熟，要大力抓“样板戏”了，她下命令把《奇》剧组调到上海来进行加工修改，并要求在半年内完成。这样，《奇》剧组于1966年1月3日抵达上海，带队的还是严永洁。江青把《奇袭白虎团》和《智取威虎山》两个戏一起放在上海的“基地”上搞“样板”，专门成立了两出戏的领导小组，江青任组长，张春桥为副组长，成员有魏文伯、曹荻秋、夏征农、王众音、严永洁等。

这段时间，江青接二连三给剧组作

修改的指示，零零碎碎，不知其数。比如“表演区没有光，灯光打不到严伟才脸上”；“搞布景的闹独立，不为戏服务，美术设计不要闹独立性”；“主要人物的唱腔安排，一是每场落脚唱腔要落在他身上；二是要有惊人之调；三是要有成套唱腔”；“四场团长抢了主要人物严伟才的戏了”；“五个俘虏兵位置在中间，不行，中间的位置要让给严伟才”；如此等等。有时还朝令夕改，比如她一会儿说戏要注意中朝关系，一会儿又说，这个仗是我们自己打的。一会儿说要全力突出主要人物严伟才，所有的掌声都要鼓在他身上；一会儿又说，严伟才成了光杆司令了。弄得剧团无所适从。

5月27日，江青又突然提出要看戏，剧组演出了修改后的《奇》剧。江青看了没有一丝笑意，也没有鼓掌。她把魏文伯、曹荻秋找去，大发雷霆，说，“这个戏让他们改坏了，没有按照我的意见办”。并提出“让他们走，马上回山东”。

魏文伯、曹荻秋很同情山东的同志，他们安慰严永洁。严永洁只能给剧团的同志做思想工作，准备回去。可是过了三天，江青把严永洁找去，说：“小严，我太性急了，你们还是留下来再改吧！”这时，《奇》剧的布景、道具已经先期运到火车站了，只好再把它拉回来。剧组又留下来改戏。江青吩咐曹荻秋、张春桥，把《智取威虎山》的编剧章力挥、作曲于会泳调过来，参加《奇》剧的修改工作，并命令要在一星期内搞出来。时间紧，压力大，严永洁整整七天七夜没睡好觉，结果栽倒在地上，被送到华东医院，医生说是过度疲劳。

到6月6日，修改稿改出来了，其实没有怎么大改。正好到上海来开会的谭启龙陪同江青观看了演出。这时“5·16”通知已经发表，江青已忙于这场政治运动。

这天看演出时江青又说又笑，又鼓掌，说：“这个戏就这样了，暂时到此为止。剧团回去参加文化大革命，然后再改戏。”剧团受尽了折腾，总算在6月8日离开上海，打道回府。

然而，《奇》剧的折腾并没有结束。

1968年9月，江青曾想抛开山东京剧团，由中国京剧院来接手修改《奇》剧。她还不知从哪里听说，《奇》剧中采用的《中国志愿军军歌》的作者周巍峙是叛徒，所以想把这首歌拿掉，特地从上海调来于会泳，让他重新设计音乐。于会泳只好用瞿希贤的歌曲《全世界人民心一条》来替代。这个戏改由钱浩梁饰演严伟才，杜近芳饰演崔大嫂。但是不知是因为查清周巍峙并非叛徒，还是别的原因，江青一直没有审查他们的演出，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1970年5月，《奇》剧组调北京，准备拍摄电影。那时严永洁已被作为“走资派”打倒了，当然不可能再由她带队了。当时的导演是苏里、王炎、尚之四、殷宝忠，编剧是孙秋潮，音乐设计是成公亮。剧团到了北京，先是修改，以及学习《智取》、《红灯记》拍摄电影的经验。修改较多的是音乐上改用中西混合乐队伴奏。1970年年底，“修改”完了的《奇》剧在北京二七剧场演出，给江青审查。江青看到第五场“宣誓出发”中，只有志愿军，而没有朝鲜人民军的参谋长时，又恼起火来，她在座谈会上说：“这是大搞沙文主义的表现！”并责问：“是谁叫你们这样改的？马上改回来！”而事实上，正是你江青下令叫剧团把朝鲜人民军的参谋长拿掉的。但是秀才遇到兵，谁能和她去论理呢？

《奇》剧总算过了关，1971年初，剧组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电影。其间因为宋玉庆一度患肝炎，有所停顿，一直到1972年10月才拍摄完成并对外公映。

五、有功之臣

遭遇厄运

后来被称为“样板戏”的那些现代戏，开始都是由文艺界的编导和演员们创排的，这些戏后来一一被江青所窃取，而那些原创者和有功之臣却绝大多数遭到了厄运。《奇》剧的情况亦如此。

原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严永洁同志从1963年开始就接手具体领导《奇》剧的加工、编演工作，在这个戏上倾注了许多的心血。可是她也是遭罪最厉害的一个。早在“文革”前一段时间，严永洁已经受到江青的猜疑。“文革”开始不久，她即被打倒。接着就开始被批斗，山东还成立了“山东省文艺界炮打严永洁司令部”，淄博也把严永洁拉去批斗。因为说她把剧本送给陆定一，所以1966年12月被弄到北京，关在文化部，并拉到天安门去游街。那时严永洁还存有幻想，她想这件事张春桥是知道的。后来才知道，把她抛出来的正是张春桥，他曾说：“严永洁跑到陆定一那里去了，拍电影没有通过江青。”于是造反派给严永洁的结论是“反对江青，破坏京剧革命”。后来严永洁被另外隔离，关在一间破房子里。那时她的爱人、原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被弄到青岛去隔离、批斗。他们家里的东西全被抄了，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北京清华大学读书，小儿子初中毕业，女儿高小毕业，两个孩子跑到青岛一个老同志那里，又碰到大搜查，那位老同志把他们送到北京另一同志家里。后来，康生定谭启龙为走资派，北京不敢留，又送回济南。孩子坐在同学家的门口，同学的母亲是宣传部的处长，她收留了孩子。

1967年，严永洁被放回济南，关在省京剧团里。造反派夜以继日地批斗她，晚上在排练场，搭起棚子，在方桌上摆一只凳子，叫她跪在上面，戴了高

帽子，挂着用细麻绳吊着的牌子，一边斗，一边拳打脚踢。造反派还宣布开除她的党籍。斗得路也不能走，只能在地上爬。有一次批斗会开到夜里11点钟，家里只有小女儿在家，严永洁不放心，要求晚上回去，到家时，摔了一跤，手臂也摔成骨折。真是苦不堪言。

接着，严永洁被拉到省话兵团、梆子剧团批斗。有一次被押上大卡车去游斗，她脸对着前面，忽然后面一根大棒打到头上，当场就晕了过去，结果落了个严重的脑震荡。后来，严永洁被放回机关隔离，对她稍为宽待一点。儿子前来探望，两人抱头痛哭。再后来，严永洁被弄到劳改农场去劳动，挑大粪，大概半年多时间。

1968年10月，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主席讲到谭启龙，于是谭启龙获得了“解放”，被接到济南南郊宾馆，严永洁一家人在一起过了个春节。此后，谭启龙在南郊半天劳动，严永洁仍回农场劳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谭启龙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不久被接到北京，在新华印刷厂蹲点。严永洁也回到了机关，但还是没有“解放”。山东省新的领导杨得志司令员派人来看望严永洁，他们看到她住在一间破仓库里，四面漏风，到处是老鼠洞，晒不到太阳。后来给严永洁换了一处房子。

邓大姐去新华印刷厂看望工人时，找谭启龙谈话，看他写的学习心得。邓大姐问起严永洁，谭启龙说她还没有“解放”，仍在农场劳动。

有一天晚上，杨得志司令员到严永洁家里，说周总理来了电话。不久，机关宣布严永洁“解放”。杨司令员派人送她到北京，谭启龙等在车站接她，这都是邓大姐安排的。严永洁入住中直招待所，不一会，邓大姐打来电话问候，严永洁非常激动，在电话里说：“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周总理！”邓大姐

说：“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大概又过了半年时间，谭启龙被派往福建工作，这样，严永洁及家人就跟随谭启龙一起到了福建。

在“文革”中，《奇》剧的主创人员也受到种种的迫害。导演尚之四和编剧之一的孙秋潮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横遭批斗。

严伟才的扮演者青年演员宋玉庆则经历了殊多颠沛和起伏。1964年《奇》剧在全国会演中获得成功，宋玉庆由此一举成名。但是在“文革”风暴的席卷之下，宋玉庆又变成了“修正主义的黑苗子”、“黑省委的红人”、“三名三高的典型”，被关进牛棚，写检查，遭批斗，还经常充当造反派批斗省委领导人的陪斗者。造反派继续上演《奇》剧，只是改了剧本，换了主演。这时，原来《奇》剧剧组的同志鼓动宋玉庆给江青写信反映情况。宋玉庆写了，把信寄给中国京剧院《红灯记》剧组的刘长瑜、高玉倩转交。信果真到了江青的手里，江青读了信，说：“小宋他们在山东吃苦了，把他们调到北京来吧！”于是在1970年，把《奇》剧剧组调到了北京，暂时编入中国京剧院三队，开始准备拍摄电影。宋玉庆受到江青的重视，又身价百倍了。让他当了剧团革委会的主任，电影拍摄完毕，回到山东，又当上了省文化局局长。

“四人帮”倒台后，宋玉庆少不得要接受审查，又一次跌入了低谷。虽然审查后，没什么大事，但局长是当不成了，又回到剧团做演员，直到1983年，他才获“赦免”，可以以主要演员的身份登台演出。抚今忆昔，宋玉庆不禁感慨系之。

《奇袭白虎团》这样一出京剧，其编演过程竟会如此复杂，如此曲折，甚至充满了刀光剑影。今天回顾这段风雨历程，当会引起我们许多思考吧！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